

中國早期數術通考

李建民

(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)

據考是宋儒王應麟(1223—1296)所撰,至今仍為流行的童蒙書《三字經》談到「數」的概念:「曰水火,木金土,此五行,本乎數。」曾經做為中國人思想律的「五行」,如歷史學者顧頡剛(1883—1980)所說,二千餘年來有極強固的勢力。

什麼是「五行」?它與「數」有何關連?

「數」在中國古代是天道的表現。而「數術」(shushu, occult arts)之學是中國傳統關於天道或宇宙的知識體系。質言之,數術是一套溝通天人的技術與理論。或者說,它是中國人的傳統宇宙觀以及此宇宙觀為基礎的預測學。因此,「數」具有推算(calculations)的意思。而數字(number)也有吉凶之分。唐代經學家顏師古(581—645)說:「數術,占卜之事。」

傳統中國古代占卜的系統,根據李零的研究主要有三系。第一、是與天文曆算有關的星占、式占;第二、是與動物、植物之靈崇拜有關的龜卜、筮占;第三、是與人體、鬼怪有關的夢占、厭劾、祠禳。如果用《漢書·藝文志》的分類,數術包括了天文、曆譜、五行、蓍龜、雜占、形法等六大分支。其中,「五行」指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種物質,古人以為五行是產生萬物的本源。五行與季節、方位等有對應的關係。在《漢書·藝文志》的五行類,主要是由式占與擇日術為主要的作品。漢代以後,正史或相關書籍分類,數術總概以「五行」之名。這是五行概念的擴大。隋代蕭吉所撰的《五行大義》便總結這之前數術理論大成。而天文、曆法逐漸自數術獨立出來。清乾隆修訂《四庫全書》時,數術含有數學、占候、相宅相墓、占卜、命書相書、陰陽五行、雜技術七類。

此外,「數術」在古代與「方技」合稱「方術」,例如《後漢書》便有〈方術傳〉。方技的內容有醫學、房中、神仙等養生的分支。正史、類書的「方術」類多包含醫藥的內容。數術、方技這兩門類知識往往是彼此滲透、交涉的。

中國主要的數術大致於戰國至西漢這三百多年之間成形。雖然不少技術在唐代之前已逐漸失傳,新出土的數術資料仍有助我們重新理解當時占卜術的發展源流。關於新出土的數術資料見李零的《中國方術考》一書。從大量新出文物可知,數術之學在周秦之間(約公元前600—前200年)曾歷經一次大的突破。這一時期的數術的術語與論述格式對後世同一類書籍影響頗大。

簡單來說,新出的數術資料所見,在戰國秦漢時期,數術發展的一個趨勢,是將「數」的Formula「圖式化」,時間、方位、數字甚至鬼神系統等結合在一起,形成中國特有的「感應論」的思維方式。

以馬土堆帛書「人字」圖為例。這幅圖主要根據嬰兒生產之時辰,對照圖中所標示的時辰所在的部位,以預占嬰兒未來命運或性格傾向。所謂人字的「字」即分娩之意。「人字」圖以人體來表達,在人體上標注春、夏、秋、冬四時,而且特別用干支在人體七個部位預占吉凶。「人字」圖為何要以人體來表達?從人字圖的解說中,提到人身各部如頭表示「富」、足下表示「賤」、或腋表示「愛」、手表示「巧」、饒富當時人對身體所賦予的意涵。也就是說,「人字」圖透過當時人對身體的隱喻與嬰兒吉凶取得類比的連繫。再者,古人認為陽氣起於子,陰氣起於卯,卯酉各半,陰陽之氣消長。「人字」圖標示四季與干支,顯示了氣的變化。閱讀本圖的方式,由人體的頭到陰部,象徵四時的推移。最後,本圖以「七」為數,即以七為週期。在這裡,數被視為一種「先天地而

已存，後天地而已立」的自在之物。這種「數」的規律性更深的表現了神秘傾向的「定數」的觀念，可以對人事產生作用。綜合上述，「人字」圖數術的內在邏輯是以四時——陰陽——數字來呈現。而以人形圖上不同部位身體的隱喻來預測嬰兒性格的可能傾向。

此外，馬王堆帛書「禹藏埋胞圖」亦可反映數術天人感應間架。所謂「埋胞」的「胞」即指嬰兒的胞衣 (afterbirth)。古人相信利用此圖選擇適當的時間、場所與方位埋胞，將影響嬰兒的吉凶、愚智與夭壽。

「禹藏埋胞圖」包括三個組成部分：一、全圖為一大方環，由十二個月的小方框依左行排列而成，每個月的月份如「正月」、「二月」等皆有標示；二、每月的方框內有十二個方位，其圖又稱為「二繩四鉤圖」；三、十二月框的內容以兩個「死」位以及從廿到一百廿的數字所組成，「死」位與數字的位置每月不同。操作者在埋胞過程中，有幾項因素是必須被嚴格遵守的，即時間、方位與數字的規律。

特別值得一提的是「二繩四鉤圖」。按《淮南子·天文》的觀念，繫住天體的是二繩、四維，一經一緯，垂直交叉，穿過中央的天極，叫做「繩」；四個角落也用繩索拴繫住，叫作「維」，若以十二地支表示便構成了「二繩四鉤的宇宙圖式」。它可以界說為一種帶有時間特性的方位——temporal space。這是理解數術最關鍵的概念。Temporal space 的圖案亦見於日晷、六博局、規矩鏡等器物，它們都體現古人的宇宙觀念。「禹藏埋胞圖」的十二月圖即是這一類的圖。埋胞避產月的大時、小時的所在位置，此即不可埋胞的凶位。從「埋胞圖」來看，每一個月的十二方位中均標明兩個死位，可知這兩個方位即是大時、小時在該月的位置了。大時源自古人對歲星的觀察。小時斗柄、月建，源自古人對北斗的觀察。

「禹藏圖」包括後世數術操作的所有元素。該圖的內容，大圖為輿地之圖，呈現上南下北、左東右西之方位；小圖（十二月圖）皆以「二繩四鉤」宇宙圖式組成；而小圖內的數字則象徵了人的壽限。所以，「禹藏圖」形成了天（太歲、北斗）、地（方位）、人（壽限）的感應關係。而透過「埋胞」這樣的活動將胞衣與嬰兒未來的命運連繫起來。這裡所說的「感應」，其中介是「氣」，它在同類或相關的事物之間起了互相吸引、感動的力量。在操作程序中，占卜者與「禹藏圖」的象徵之間，或者，事後卜問事項的應驗不是機械性的反應，而是無有先後遠近的一同呈現。

這種感應式的思維邏輯，可以從任何一點出發，藉用符號化與格式化的言語做無窮的推衍。《史記·孟荀列傳》中說明它的方法特色是「必先驗小物，推而大之，至於無垠。」所有的中國傳統實用知識或技術均普遍套用了這種思維模式，傳統中醫學就是一個為人熟知的例子。

《漢書·藝文志》著錄有關數術類的作品共 2558 卷之多。清代學者章學誠（1738—1801）認為這一類的書以圖 (illustration) 為著。近年新出土的數術資料所見，圖的確是數術書籍重要的組成部分。宋代的《易》學有「圖數之學」，圖、數配合來講，往前追溯，應與這一個傳統有關。

數術的書籍與其他類技書籍（例如醫學）共有若干特色，即作品往往不題撰人，而假托為神話傳說中的帝王、人物彼此的對話記錄；或者至少依託書中所載技術與這些人物有某種連繫。再者，不同時代、性質不一的內容往往疊壓在同一部作品之中。甚至同一篇文章中，老師的作品與學生的續筆之作雜揉在一起。此外，書籍與技術均係藉由師徒間代代秘密相授而流傳發展。在這種密傳的方式下，數術的術語與格式雖迭經散亡、改動，卻仍能保持相當延續性。

數術書籍具有實用價值，也與普通人的生活密切（如現代中國人社群仍然流行的「農民曆」或「黃曆」）。在古代逐漸出現「手冊」(manual) 類型的作品，以便一般人翻查之用。另一方面，由於數術的預測對象往往是國家大事，而且其神秘傾向對人心具有一定

的煽惑性，其與政治權力操作歷來密不可分。所以這一類知識，尤其是天文與星占，大多為官方所控制，並常三令五申禁止民間私自學習。

此外，過去學術界有一種意見，即陰陽五行之學主要是鄒衍開始倡導的。但愈來愈多的出土資料顯示，從天文、曆算、龜筮占卜等技術實踐中所提煉出來的宇宙觀，才是陰陽、五行等概念的來源。而且儒家、道家等先秦思想也都援之立說。如漢初的「黃老」思想，或稍晚的讖諱學說都是數術之學所派生的相關知識。《四庫全書提要·數術類》說，數術之學「實皆《易》之支派」。這個說法並不正確。歷史學家顧頡剛說，中國的學術以數術最難，兵書、醫書不可解的部分也多與數術有關。可見數術史的研究，其貢獻當不在數術本身而已。事實上，它可說是傳統中國的儒家等文化之外的另一個主流。

參考文獻

一、原始資料：

李零主編，《中國方術概觀》（北京：人民中國出版社，1993）共十卷，十三冊。
有關數術的內容有占星卷、式法卷、選擇卷、星命卷、相術卷、雜術卷、卜筮卷等。

中村璋八，《五行大義校註》（東京：汲古書院，1984）。

劉道超譯注，《協紀辨方書》（南寧：廣西人民出版社，1993）。

二、近人研究

李零，《中國方術考》（北京：人民中國出版社，1993）。

李建民，〈馬王堆漢墓帛書「禹藏埋胞圖」箋證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Vol.65 Part4（1994）。

李建民，〈馬王堆漢墓帛書「人字」圖考釋〉，《大陸雜誌》Vol.90 No.5（1995）。

李建民，〈中國古代「禁方」考論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Vol.68 Part（1997）。

李建民，〈方術史研究芻議〉，《中國科學史通訊》No.15（1998）。

黃一農，〈從尹灣漢墓簡牘看中國社會的擇日傳統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Vol.70 Part3（1999）。

劉樂賢，《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》（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4）。

劉國忠，《五行大義研究》（瀋陽：遼寧教育出版社，1999）。

饒宗頤、曾憲通，《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3）。

中村璋八，〈中國思想史上數術〉，《東洋思想宗教》No.14（1997）。

Marc Kalinowski, *Cosmologie et divination dans la Chine ancienne* (Paris: École Française d'Extrême-Orient, 1991) .